

读城

近代中国城市化中的北外滩

王启元

今塘沽路与大名路相交的街区，即为历史与空间上的“虹口源”。自19世纪末新来虹口的外侨与各地移民，为上海城市化做出各自贡献的同时，身上同样留有深深的虹口烙印。

近代史界有句俗语：“一部近代史，半部是上海”，这里既是发生历史的场所，又是被叙事的对象。当然，上海城市空间绝非演绎近代史的静止的“容器”或“平台”（借用列斐伏尔的名言），其自身拥有时空上的多重因缘；正是多元的城市发展脉络，注定了今天上海多彩的精神与空间线索。

近代虹口的源点

作为现代城市的上海，严格意义上始于19世纪中叶；之前的松沪府县乡保、“东南壮县”的历史，只能算作1843年开始的“近代上海”的前史。上海开埠后的1845年10月，苏松太道官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（George Balfour）共同公布了第一次《土地章程》，划定上海县城外北郊的租界“外滩”，这里日后诞生了包括英领馆、各大洋行在内的近代建筑群，并逐渐扩大成面积巨大的英租界及公共租界。“重返江湾三耶稣会士”之一的南格禄（Clausius Gotteland）则在1842年7月，于胜明阁老徐光启的墓地附近筹建新式学堂、教堂，把徐家汇建成“（上海县）西乡一大市”（民国《上海乡土志》）。“外滩源”与“徐家汇源”今天业已成为上海重要的城市景观。相似的例子不在少数，近代城市多元共生的特质，同样适用于苏州河北岸。

明清以来，松江府上海县与北面苏州府嘉定县及所析宝山县，以吴淞江河道“旧江”为界。明代中叶吴淞江潭子湾以东，改走新濬宋家港河段，即今市区潭子湾以下的苏州河，“旧江”与苏州河间隔断了一片上海县的狭长土地；县二十三及二十五保，两保以虹口港为界。“虹口港”因吴淞江泄洪口得名。

开埠后，略晚于英国人来华的美国人发现此处水陆交通便利。圣公会文惠廉牧师（William Jones Boone, 1811—1864）在1845年（清道光二十五年）抵达上海。他先在上海县城内，后至苏州河北，建起虹口救主堂（Church of Our Savior）；沪北近代城市正是沿着救主堂为中心的街区向外发展。救主堂北一条东西向马路文监师路（Boone Road，音译为蓬路，今为塘沽路），即以文惠廉的名字命名，与教堂同时建于1848年，东起自虹口路、后改百老汇路（今为大名路），沿着苏州河北一直修到了老闸以西。而堂东南的百老汇路，筑成于十余年后的1864年，沿着黄浦江，西达外白渡桥（Garden Bridge of Shanghai）的前身威尔斯桥，东至汇山码头附近。这一带很快建起上海最早的码头船厂“老船坞”（Dewsnap Dock），开设医馆、新式学堂并出现上海最早的集中领事馆区；中国最早的火车站、最早用上电路灯的街区，同样出现在文监师路与百老汇路上。文惠廉的救主堂所在的空间，无疑

是近代虹口乃至沪北的源点，今塘沽路与大名路相交的街区，即为历史与空间上的“虹口源”。

“十里洋场”何在

开埠后的上海常被称为“十里洋场”，一度蕴含保守主义者“夷夏之防”的担忧。“十里洋场”究竟只是个泛称，还是曾有所指，关系到早期上海市中心的空间“现场”。1883年出版的《淞南梦影录》载读袁祖志《望沪南》“如向十里洋场，采风问俗”；《申报》数据库中，该词最早出现于1886年。此时所指的“洋场”究竟在哪，有学者提出“洋场”与“洋泾”相近，当指洋泾浜；也有指其为“大马路”，皆有难以自圆之处。

吾国人以里程数命名地名的做法，十进制以内的数字以实指居多；如依然为人熟知的“三里屯”“五里桥”“七里山塘”“仓前九里”等等。那么，“十里”之数，是判定其是否为实指的重要指征。“十里”对于任何一座近代城市来说，都不是一个小数字。现存世1884年上海城厢租界图，彼时租界西缘尚在西藏路沿线，跑马厅属郊外，苏河南北租界东西，无论如何没有笔直的“十里”纵深。英国人设租界后，沿黄浦江滩，筑大马路黄浦滩路，其向南延伸线达法租界外滩的东门外护城河寺浜（今中山东一、二路）。文惠廉去世前一年的1863年6月25日，美驻沪领事熙华德（George Frederick Seward, 1840—1910）与继任上海道台黄芳议定美租界划界章程，迅即与南岸英租界合并成为“公共租界”。公共租界北段也沿江修筑了自威尔斯桥至汇山码头的“百老汇路”。两条租界的沿江马路总长宽正好为十里，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“十里洋场”一词产生的背景与意义。南北沿江大道及其周边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建设的城市空间，而其沿钱之长，纵深之广，为后来20世纪30年代起的上海城市腾飞打下扎实的基础。

移民与认同

近代城市化“虹口源”带来第一代中外移民。移民不仅迅速融入本地社会生活，也很快成为上海本土精英的代表人物，在公共生活中展示19世纪“上海人”的独特气质。这其中，最有代表性的是“公共花园”事件，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就是“华人与狗不得入内”一事。此事经多方演绎、建构，已与实际相去甚远，不过外滩“公共花园”在19世纪80年代因各种理由限制华人人入内的行为，确有发生。作为直接回应，在沪国人领袖频繁向英国工部局发起抗议，自1881

年4月，八位本地领袖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，要求允许华人人入，并通过不懈抗争，最终迫使工部局在外滩公园西再建“华人公园”。参与的八位本土人士——唐廷桂、谭同兴、陈咏南、李秋坪、吴虹玉、唐廷枢、颜永京、陈辉庭，皆出自虹口。主事者为时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唐廷桂，同时也是日后著名的虹口广肇公所创始人之一，余五位为其粤籍麾下，与虹口广肇公所有直接关系（参陈晓平《慈善家唐廷桂与“华人不入内”》）。而另两位虹口人，则是来自“虹口源”的圣公会华人牧师颜永京与吴虹玉。彼时颜永京已在为新建的圣约翰学院奔波，而其老友吴虹玉则主持了位于虹口的圣约翰学院医学院的筹建，位置就在“虹口源”核心区文监师路上，而同仁医院的翻新扩建，也得到李秋坪在内的粤籍富商们的解囊支持。这八位本土领袖与工部局的交涉，可以看作虹口本土精英争取更多华人参与上海城市管理的决心。

早期旅沪的西洋外侨们同样为这座城市贡献力量。作为工部局董事的汉璧礼（Sir Thomas Hanbury, 1832—1907），与工部局当局一起在虹口各地创办学校，还曾建议筹建上海第一家室内菜场“中央菜场”，选址在洋泾浜南岸今宁海东路东、近延安路处，此处民国时仍名“菜市街”。尽管菜场计划失败，但其名仍与菜场有着不浅的因缘。由于他对公共租界建设的贡献尤其在慈善方面的投入，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，工部局以其名字命名虹口一条马路：东汉璧礼路（East Hanbury Road），其与文监师路在蒙养学堂以西百余米处交汇，并与密勒路一起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街区；汉璧礼路命名的次年，工部局便在这片三角形地带建设市内菜场，这大约也是上海最早的新式菜场。

虹口有文惠廉、文恒理、小文惠廉父子留下的圣约翰学院医学院及同仁医院，雷士德（Henry Lester, 1840—1926）留下的工学院与医学院，嘉道理爵士（Sir Elly Kadoorie, 1867—1944）的犹太人青年学校，虹口圣心堂走出的饶家驹神父（Jaquinot de Besange, 1878—1946）及其战时安全区等。更为人们熟知的是战时来此避难的犹太人；自19世纪末新来虹口的外侨与各地移民，为上海城市化做出各自贡献的同时，身上同样留有深深的虹口烙印。

“虹口源”的延伸

自19世纪末开始，救主堂沿文监师路以西已遍布新式学校、医院及社区，过吴淞路便是日侨的集中地。其沿百老汇路以南至外滩，除了洋行、商辅之外，则为著名的黄浦路上近代上海使馆区，及1857年于“韦尔斯桥”北堍建成的礼

查饭店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救主堂以西美驻沪领事名筑熙华德路（Seward Road），同样西南至“韦尔斯桥”，沿途则有著名的芥川龙之介来沪所居万岁馆旅店。相比虹口港西岸高速的城市化，东岸租界则在港口码头、水厂电厂等大型设施方面建设有加。沿新浜两岸迤西的租界区内，则有蔡元培、张元济、俞明震的旧寓，而文昌宋氏、嘉定牛氏家族更是生长于斯。“虹口源”及周边租界的空间很快趋近饱和。

然而因为苏河以北复杂的行政区划，“虹口源”发展出来的租界被局限在沿江狭长的区域之中。工部局与在沪英商曾想过办法，拓展沪北纵深，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北境的江湾镇；北四川路、江湾路等多条马路从租界向江湾镇腹地修筑。光绪初年，英商尝试自租界内修筑吴淞铁路沟通江湾，直窥吴淞，虽然曾一度通车，但仍被当局赎回拆去。不过这次尝试让沪上有识之士看到了沪北城市化的潜力与价值，广袤的“大江湾”之于狭长的“虹口源”，无异于充满希望的田野。

江湾与“虹口源”的缘分并非到铁路出现才建立起来，虬江下游所分虹口港与俞泾、芦泾二浦，勾连起古典时代北外滩与江湾镇间最重要的水路交通。从“虹口源”走出的“公共花园”事件华人代表之一吴虹玉，便曾在江湾镇活动，多位子女皆在此地出生，由于英年早逝，诸子又沿河而下“虹口源”投靠大伯父颜永京，其中二子辗转圣约翰中学、医学院，又在临床实习时回到“虹口源”的同仁医院工作学习，他就是近代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先生。

1898年，在第二条铁路淞沪铁路通车后，沪北近代城市空间开始进入发展快车道，由本地士绅主持的铁路工程，把火车站站点搬出租界，放到了旧江故道上，城区首发的前三站皆在江湾城市化的核心区。因为空间相邻及成功的城市化，大片邻近北段租界的江湾土地，在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划入上海特别市成为“华界”，此后“大上海计划”中上海特别市中心就放在了当时的“新江湾”。即便遇到两次对日作战毁灭性的破坏，日占时期仍将江湾地区作为市中心的首选位置经营，而1946年后，国民政府开启全新的“大上海都市计划”城市规划，仍有强烈的沪北经营战略倾向，从江湾到吴淞的进一步推进，仿佛半个多世纪前从“虹口源”沿水路、铁路上的延续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）

纪念

忆邦佐师

胡伟

严格意义上说，我是王邦佐老师的“开门弟子”。那是1986年，先生正式担任副教授（此前由于全国职称评审“冻结”，恩师未能及时晋升高职称），而我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，经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而成为政治学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，先生便成为了我的导师。在此之前，先生给我们本科生上过《政治学原理》等课程，也曾关注我的成长，但个人之间联系不多。成为他直接带的研究生后，交往就比较多了。可以说我是在恩师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学者，也见证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。如今我已过知天命之年，回眸邦佐师的音容笑貌，抚今追昔，感慨万千。

邦佐师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，也是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奠基者。在1980年代初政治学在中国恢复重建之时，先生还不到50岁，国内有一批年长的“元老”，除了张友渔、钱端生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名闻遐迩的前辈，还包括赵宝麟、夏书章、徐大同、邱晓等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学界“四老”，那时邦佐师正值中年，貌似算不上政治学的元老级人物，所以他本人也曾当着“四老”的面开玩笑地说：“我这个年龄哪里勿尴尬，说老不老，说年轻不年轻。”但实际上，邦佐师对于中国政治学的贡献是极大的，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开放后政治学的主要创建者之一。

目前不少人提及邦佐师对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贡献，通常会说到1982年由他担纲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，被称为“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”。但在在我看来先生的一个更大贡献，是从1980年开始重建了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，并使其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镇，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，地位远远超过1952年院系调整前复旦政治学的水平，不仅对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具有深刻影响，而且对中国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走向也打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。

我的人生道路也是在邦佐师指引下一路走来。他不仅是我的研究生导师，更是我的人生态度。我学生时代心高气盛，考上了复旦大学，就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到大四时，对自己未来的入生道路感到茫然，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到大四时，对自己未来的入生道路感到茫然，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到大四时，对自己未来的入生道路感到茫然，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

我的人生道路也是在邦佐师指引下一路走来。他不仅是我的研究生导师，更是我的人生态度。我学生时代心高气盛，考上了复旦大学，就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到大四时，对自己未来的入生道路感到茫然，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到大四时，对自己未来的入生道路感到茫然，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

我的人生道路也是在邦佐师指引下一路走来。他不仅是我的研究生导师，更是我的人生态度。我学生时代心高气盛，考上了复旦大学，就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到大四时，对自己未来的入生道路感到茫然，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

我的人生道路也是在邦佐师指引下一路走来。他不仅是我的研究生导师，更是我的人生态度。我学生时代心高气盛，考上了复旦大学，就想干一番大事业，并没有把做学问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。

视界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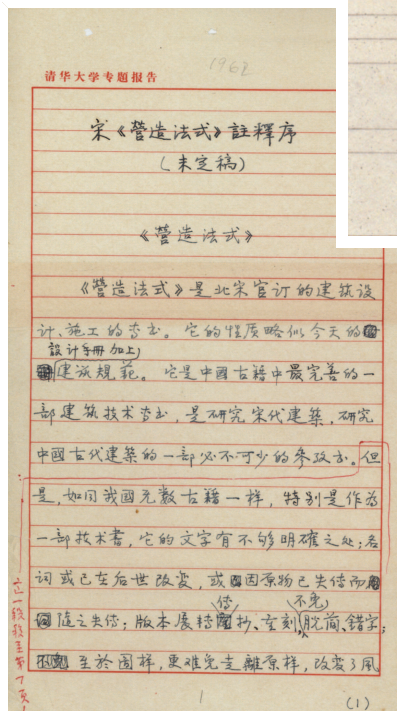
破译《营造法式》的梁思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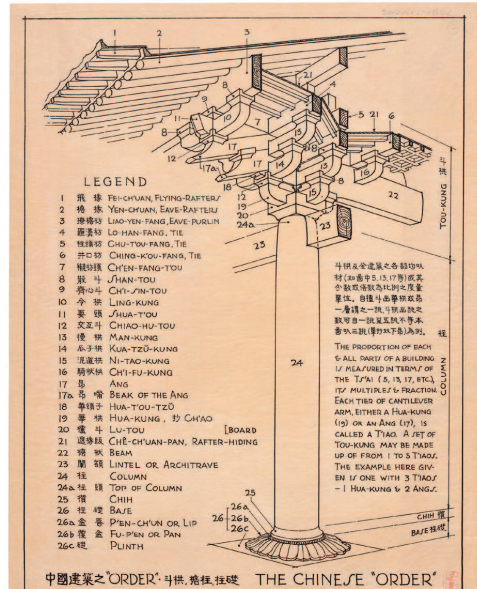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，“栋梁——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”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。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收到梁启超寄来的北宋《营造法式》开始，梁思成便立志研究、破译这部无人能懂的“天书”。加入营造学社后，他首先通过学习清代建筑和清工部《工程做法》理解清式建筑做法，并于1934年出版专著《清式营造则例》；继而结合唐、宋、辽、金建筑实物，逐步释读《营造法式》——尤其在深入理解法式“大木作制度”中“以材为祖”的建筑模数制的基础上，将其与西方古典建筑中以柱径为设计模数的ORDER（今译“柱式”，梁思成曾将其译作“型范”）相提并论，并极具开创性地提出这是确定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，此乃梁思成对中西建筑史比较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。在《中国建筑史》等一系列论著中，梁思成把宋《营造法式》和清《工程做法》称作中国建筑的两部“文法”课本。1960年代，梁思成重拾因种种原因停滞多年的《营造法式》注释工作，并在“文革”前夕与助手们完成了大部分主要内容。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日。

图文均出自“栋梁”展

《营造法式》（陶本），1925年，朱启铃旧藏，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



1961年9月，梁思成提出整理《营造法式》与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工作计划。图为1963年梁思成“宋《营造法式》注释序（未定稿）”手稿，清华大学档案馆藏



梁思成《图像中国建筑史》插图：中国建筑之“ORDER”，1946年完稿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